

大 專 用 書

現代西洋外交史

—— 正統主義和民族主義時代 ——

楊 逢 泰 著



三民書局印行

現代西洋外交史

—正統主義和民族主義時代—

楊 逢 泰 著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
美國密歇根大學公共行政研究員
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政治碩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教授
兼訓導長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初版

◎ 現代西洋外交史

基本定價叁元叁角叁分



著者 楊逢泰
發行人 劉振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八—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版字第一〇二〇號

自序

人類懷着希望步入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期，在無窮盡的時間之流中，這是一個獨特的時代，因為人類正徘徊在文化的分水嶺。人類沒有「預知」的能力，我們無法斷定將來，但是人類生活在時間之中，這是與野獸所以不同之處。德國十九世紀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曾說：「牠們吃草、牠們搏鬥，牠們繁殖和死亡在一個永恒的現在之中。」可是我們人類是時間的動物，歷史是我們記憶的全程，我們生活在過去、現在和將來之中，古今中外的哲人都忠告後代，「以歷史為鏡！」「記取歷史的教訓」，暗示着歷史的巨輪不斷的在反覆循環着，後代人類應以理性和智慧在時間之流中把握或者是修正應循的方向。

凱恩（Robert A. Kann）指出：「如果歷史的類推是有意義的，吾人自然必須對歷史情勢的懸殊作寬大的默認。」誠然，決定人類歷史軌跡的因素殊為複雜，武斷的作歷史的類推似無裨益。除探索歷史之外，必須「寧靜的思考世界事務。」

公元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出現在政治舞臺世界進入現代時期。拿破崙的大軍在「自由、平等、博愛」旗幟的掩護之下橫掃歐洲大陸，法蘭西民族具有人道主義者使命感的狂熱。拿破崙戰爭後，自由主義和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這一對孿生運動興起於歐洲。作為保守主義者梅特涅視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如洪水猛獸，為了撲滅革命的火燄和維持歐洲的和平，梅特涅經由擊敗拿破崙的「歐洲協調」來對付方興未艾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革命，以維持奧地利多元帝國的壽命。這位

爲了國家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平衡大師憑其權謀術數，竟然能夠安排與奧地利在日爾曼稱霸的普魯士以及企圖向西擴張的俄羅斯參加他維持現狀的「體系」。梅氏所憑藉的正統主義，根據季辛吉的解釋是「有限衝突的國際秩序」，由爭執中的五強——奧、俄、普、英、法——在公會外交中以談判的方式來調整歧見，以獲得一致的意見。梅特涅是幸運的，因爲當時五強之間的意識型態的差異有限，尙可達成妥協，因此梅特涅代表正統主義能夠扮演調停者的角色。

拿破崙崩潰之後，俄國取代法國構成了對中歐的威脅，梅特涅扮演羅馬神話中兩面神（Janus）的角色，以一個面孔望着法國，以另一個面孔注視着俄國，不但保衛了奧地利帝國，而且將其變成「歐洲的必需品」（“European necessity”）。梅特涅也扮演「歐洲馬車夫」（“The Coachman of Europe”），控制着歐洲歷史的巨輪。奧地利帝國是「時代錯誤」（anachronism），其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命運，然而梅特涅以其卓越外交所奠定的基礎，維持帝國的壽命垂一個世紀之久。三十九年執政的悠長歲月是一幕悲喜劇的非常演出。「三十九年來，我扮演着擊退浪濤的大岩石的角色。」梅特涅的自我寫照是這幕悲喜劇的最佳說明。梅特涅的喜劇是，作爲正統主義的岩石，奠定了奧地利帝國的基礎；他的悲劇是，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浪潮吞噬了這塊岩石。洶湧澎湃的時代潮流，並不是一塊岩石所能阻擋的。

在歷史的軌跡上，梅特涅自始至終，駕着正統主義的馬車，作撤退時的「後衛行動」，歷史的巨輪壓碎了這輛馬車，不過借用軍事術語，這是一次漂亮的「後衛行動」。一八四八年，奧地利受法國二月革命的影響，維也納的自由主義者迫使梅特涅離開政治舞臺。

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戰爭，表面上是法、俄兩國爲控制聖地的鬥爭，而實際上是英、法「自由同盟」將俄國權力排除於歐

洲的戰爭。普奧兩國爲不同的理由而宣佈中立，曾爲神聖同盟的成員竟然擺脫了俄國，使聖彼得堡有孤立之感。此後，「克里米亞聯盟」（“Crimean coalition”）變成了俄羅斯帝國的夢魘，而克里米亞戰爭也摧毀了「歐洲協調」。可是「歐洲協調」的觀念却不絕如縷，爲後代政治家指出了維持和平的可循途徑。

加富爾和俾斯麥是克里米亞戰爭真正的勝利者。因爲奧地利在失去俄國的支持後，意大利和德意志始有統一的可能性。意大利和德意志這兩個「地理上的名詞」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幾乎同時完成了統一大業，澈底的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生活。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之後，意大利統一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皮特蒙（Piedmont）和薩丁尼亞島（Sardinia），依曼紐爾二世（Emmanuel II）臨危受命，知人善用，將統一民族的艱鉅任務託付於加富爾。馬志尼是意大利統一的先知，而意大利的統一任務，必須由加富爾這位政治家和外交家來完成。在對奧戰爭中，民族主義變成了民族國家締造的動力。意大利統一的三傑之一——加里波底終能大公無私的將那不勒斯和意大利王國合併，證明他和馬志尼與加富爾一樣的偉大。現代意大利是在自由主義的憲法號召下，歌劇家、文學家、軍人和外交家們通力合作所締造的。意大利必須「忍耐」，等待有利的時機，一八七〇年乘普法戰爭的良機，王家軍隊進入羅馬，意大利三色國旗飄揚在羅馬永恒之城。

普魯士的興起，並不是大自然特別的恩惠，現代德意志是英明的君主、果斷的首相和卓越的軍人們所創造的。他們深信普魯士的陸軍是完成民族統一使命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陸軍不僅代表着「力量」，而且代表着「道德」和「宗教」。

當自由主義者在議會否決計劃時，俾斯麥的果斷，扭轉了德意志民族的歷史，「今天的大問題，不是議會辯論和多數表決能決定的……能

決定的唯有鐵和血。」鐵血宰相爲了完成民族主義而犧牲了自由主義。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〇年，德意志民族在三個戰爭中逐漸凝固起來。當「歐洲的首都」——巴黎陷落時，俾斯麥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大業。歷史學家說，現代德意志是普魯士人的天才、勤儉和堅毅不拔的精神所創造的碩果。

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民族國家締造的過程，有何軌跡可循，以及如何判斷我們自己民族國家的命運呢？在海峽對面，經共產主義統治一個世代之後，爲什麼有那麼多的同胞循不同的途徑，冒生命的危險，回到自由祖國？這些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柏拉圖說：「政府反映人性」，馬列主義的實驗是非人性的，凡不合人性的也永遠不是智慧的。在海峽對面的中國人已憬然而悟：共產主義絕不適合於中國人，也終將被整個人類所唾棄。梅特涅的教訓是：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是歷史的主流，在工業革命後，民生主義也滙合了此一主流。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統一過程中，我們所獲的啓迪是：臺灣命定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基地。梅特涅曾說：「國家的政策基於歷史而非小說，基於知識而非單純的信心。」我們作爲當代中國人，身負統一中華民族的神聖使命，希望本書能提供我們所需的歷史教訓和歷史知識。

人類的歷史是驚心動魄的戲劇，所不同的是沒有導演，也沒有既定的劇本，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每一位演員都是憑自己的智慧、知識和良知作即席演出，扮演不同的角色。梅特涅演出的是一幕悲喜劇，一八四八年代表着正統主義時代的逐漸沒落；而克里米亞戰爭揭開了民族主義時代的序幕。一八七一年意大利和德意志同時完成了統一大業，這是現代西洋外交史的第二幕的結束。俾斯麥在晚年時已領悟到：這已經是世界政治的時代。他的後繼者威廉二世訴諸世界政策，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和約是一個追溯既往的和約(retrospect peace)，希特勒統治

下的德意志，依照季辛吉的說法，變成了革命性的強權，加上墨索里尼的國際社會達爾文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 Darwinism）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世界邁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時代和兩次大戰時期是筆者正在撰寫現代西洋外交史第二部的主題，希望不久能與讀者見面。

「歷史是科學，不多也不少。」筆者對拙作不敢作如此觀，但絕無偏見和主觀意識，所有資料來自文件和權威著作。雖然如此，但錯誤和缺失是難免的，敬請讀者們不吝賜教。本書拖延甚久，筆者歉疚萬分。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的耐心和容忍令人感激，也令人難以忘懷。本書脫稿之際，也正是「大辭典」出版之時。回憶在大學讀書時，英千里老師曾說：約翰生（Dr. Samuel Johnson, 1709-1784）所編纂的辭典對英國的文學有極大的貢獻。劉振強先生以十四年的時間，從事於「大辭典」的編纂和出版工作，實在是企業家負起社會責任的最佳表現。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吾妻曾縵雲女士敦促我要有「責任感」，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我是否已經負起了應盡的責任？這是本書出版後最大的問號。來臺三十四年，無時不念親恩，而今在大陸上，家已成灰，而親墓生青草。謹將此書獻給為三民主義統一大業而奮鬥的中國人，以報親恩。

楊逢泰謹識

民國七十四年雙十節

現代西洋外交史

——正統主義和民族主義時代——

目 次

自 序

第一編 正統主義時代

第一章 維也納會議：追求均勢…………… 3

第一節 歐洲均勢的建築師…………… 3

第二節 歐洲均勢的締造……………19

第二章 歐洲協調：追求秩序……………41

第一節 人類第一次「國際政府」的實驗……………41

第二節 經由會議體系建立國際秩序……………53

第三節 希臘革命：東方問題的序幕……………78

第二編 民族主義時代

第三章 歐洲協調的崩潰…………… 103

2 現代西洋外交史

第一節 埃及問題：希臘獨立的後遺症·····	103
------------------------	-----

第二節 克里米亞戰爭：摧毀歐洲協調·····	110
------------------------	-----

第四章 意大利統一：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同時完成 ··· 129

第一節 意大利統一的派系·····	129
-------------------	-----

第二節 現代意大利的締造·····	142
-------------------	-----

第三節 邁向羅馬——「永恒之城」的里程·····	157
--------------------------	-----

第五章 德意志的統一：民族主義是最高的優先····· 171

第一節 向自由主義挑戰·····	171
------------------	-----

第二節 丹麥戰爭·····	181
---------------	-----

第三節 七週戰爭：日爾曼內戰·····	189
---------------------	-----

第四節 普法之戰·····	200
---------------	-----

參考書目 ····· 233

第一編

正統主義時代

第一章 維也納會議：追求均勢

第一節 歐洲均勢的建築師

公元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歐洲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影響深遠，其價值可以與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光榮革命以及工業革命相比。它摧毀了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以及思想、外交、戰爭中業已建立古老秩序中的里程碑。它代表着君主專制政體向議會政治低頭。革命的法蘭西認為：這是代表着全人類的革命，而革命的普遍性經「人民和公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 簡稱人權宣言)的洗禮之後，引起歐洲統治者的敵意。「人民的主權」(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的觀念應該導致民族獨立，這是法國佔領所產生的直接結果。法國的革命者有意傳播自由主義(liberalism)，可是由於錯誤而創造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

一八一五年的歐洲只是「地理上的一個名詞」，存在着持續的力量和改變的力量之間的緊張關係：前者包括君主制度、教會、貴族以及在長期動亂之後對和平穩定的強烈願望；後者中有工業主義的傳播，以及

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醞釀。

自從十七世紀後期，歐洲的統治者在君主制度的傳統上增加了專制主義。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創造了光榮的法蘭西，自稱，「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I am the State），這是君主專制獨裁最佳的寫照。君主和教會的密切同盟是歐洲的傳統。在法國的教會正如封建貴族和君主一樣受到大革命的攻擊。教皇庇護七世（Pius VII）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於一八一四年「凱旋」回到羅馬，以土地為基礎的貴族是強有力的保守力量。在滑鐵盧之後，這些保守的力量再度抬頭。盡管如此，歐洲進入了一個迅速而根本改變的時代。

蒸汽機的應用是工業革命的基礎，機器代替了人力；而有工廠的興起，改變了歐洲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其影響是政府和政治的整個意義和功能作革命性的改變。在以前，政府只要關切公共秩序和民族的安全，現在必須從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最低層次做起。現代歐洲所探索的是一種完全新穎的國家（state），這是十九世紀歐洲最大運動的共同基礎：一方面是民族主義，另一方面是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①

古代的世界中就有民族主義的情操。舊約聖經中的故事就是人類早期民族主義的表現。海斯（Carlton J. H. Hayes）認為「民族主義是原始社會的一個屬性。」而原始的部落主義（tribalism）就是「小規模的民族主義。」^②法國大革命播下了現代民族主義的種子，使十九世紀逐漸進入民族主義的時代。拿破崙時代的法學家接受了「世襲國家」（patrimonial state）的觀念，而將「民族」代替了「國王」，因此國土（country）不再

① David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p. 61-98.

② 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C. 1931), pp. 1-2.

是國王的世襲財產，而變成了「民族」的世襲財產。這種改變不但使民主政治的觀念也爲之改變，而且也使民族自決有了理論的基礎，於是產生了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在此時期之前，民主政治的傾向是以人民在政府中有代表權，人民可以用政治行動來制止政府，或者是以人民的利益來指導政府權力的形式來表現的。可是法國革命使民主政治的方式隨之改變，民主政治不復爲個人、階級或法人團體的代表權，在國會中對政府運用憲法的控制而已，而是人民本身變成至高無上的權威。從臣民的角色一躍而變爲主權的角色，這種改變給予中世紀之後君主神聖權利的理論一個致命的打擊，人民的神聖權利代替了君主的神聖權利。在新的民族和民主觀念的影響之下，人民不再是一盤散沙，變成具有形狀和組織的整體，此即所謂「民族」，賦有主權，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與「國家」成爲一體，而成爲「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一羣人民有權爲自己制定憲法和選擇自己的政府。這種革命性的理論很容易變成一種要求：即人民有權來決定隸屬於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國家；或者是本身構成一個獨立的國家。^③

在十九世紀，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雖然決不是同義字，可是這兩個概念有變成衡等的傾向，或者至少是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一般的認爲民主政治、或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主要的力量。^④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這

③ Alfred Cobba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 5.

④ René Albrecht-Carri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7), p. 20.

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也是新穎的名詞，而自由主義者對於他們所指的「自由制度」(“liberal institution”)正如民族主義一樣，隨着時間和空間有所不同。沙皇亞力山大一世時代俄國的自由主義者對於沙皇有意在遙遠的將來考慮一個憲法的觀念已感到滿足。一八一五年後，比利時的自由主義者致力將比利時脫離荷蘭王室的統治，一八四八年，奧國的自由主義者

兩個孿生運動的思想^⑤ 隨着拿破崙的雄師傳播到歐洲，思想之散佈，猶如水面投石，漣漪四佈。

拿破崙是最後一個古代人，也是登皇帝寶座的第一個現代人。^⑥ 他將過去與未來劃了一條線，拿破崙帝國在歐洲崩潰之後，最重要的改變是俄國取代了法國，構成了對中歐的威脅。^⑦ 地處中歐，作為保守主義的多元帝國，奧地利自然的變成了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敵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維也納會議揭開了歐洲外交史的新頁。

維也納會議顯貴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俄國沙皇亞力山大一世（Alexander I, 1777-1825），這是一位複雜的人物，具有崇高的理想主義，精明詭詐、神秘的虔誠、世俗的野心、慷慨的熱誠和道地莫斯科人的狡猾。沙皇懷着一個明確的目標蒞臨維也納，長遠以來，他的周圍有來自瑞士、日爾曼和波蘭等地的謀士，因此感染了民主、自由和民族性的理

（續）旨在推翻梅特涅。一八五〇年代，加富爾在意大利旨在建立一個類似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時代在英國所建立的立憲政府。

Irene Collins, "Liber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in *European Political History (1815-1870): Aspects of Liberalism* ed. by Eugene C. Black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c 1967), pp. 105-108.

- ⑤ 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既然淵源於同一理論基礎，所以季辛吉稱之為孿生運動。

See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 248.

- ⑥ Hilde Spiel,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Chilton Book Company, c. 1968), p. x.

- ⑦ Brison D. Gooch,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0), p. 54.

想。亞力山大一世雖然外表裝飾着世界主義，而心坎深處仍然是俄國人。^⑧作為一個世界主義者整個世界是他的遊樂場，四海為家，可是在家時又感到不自在，沒有人能比他自己形容得更好。他說：「我在俄羅斯僅是一位幸運的偶然而已。」^⑨亞力山大一世，這位十九世紀歐洲棋盤中最具吸引力的人物，到維也納的目的是為了俄國的利益，而俄國當時的利益集中在波蘭。^⑩

地理是歷史之母，英倫三島位處於歐洲大陸西北邊緣海上的此一事件是了解英國外交的萬能鑰匙。大英帝國的命脈是海上的霸權。除海上優勢之外，另一個指導英國行動方針的因素是權力平衡。此一原則有許多解釋，就英國而言，根據葛奇（G. P. Gooch）所說：權力平衡意味着「部分的由於有意識的，部分的由於本能的，決定以外交或武力來抵制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立刻成長為可怖而潛在的敵人而威脅到我們民族的自由、我們海岸的安全、我們商業的平安或者是我們外國領土的完整。」^⑪

拿破崙崩潰之後，英國的主要願望是能「採取自由行動，將安全信託於海軍」。所謂「行動自由」就是一般所稱的「光榮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⑫卡斯利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Robert Stewart, 1769-1822) 於一八一二年出任英國外相，當時的英國甫從十年孤立的嚴格考驗中脫穎而出，決定暫時放棄孤立主義，卡斯利與此項決策有關。^⑬所以他在維也納雖然受到與會各國代表的尊敬，可是在國內却受

⑧ J. A. R. Marriott,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1815-1939*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0), p. 18.

⑨ Spiel, op. cit., p. 163.

⑩ Marriott, op. cit., p. 18.

⑪ G. P. Gooch, *Studies in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9), p. 87.

⑫ Ibid., pp. 87-88.

⑬ Kissinger, op. cit., p. 29.